得罪不起的黑手党

黑手党在西西里的势力绝对不容小觑，这与黑手党的优质“服务”分不开。

意大利黑手党的名字叫做“玛菲亚”，首领的称谓是“教父”。在西西里岛，几乎人人都要定期向地盘的主人缴纳“保护费”，拖欠不缴的农民，牲畜经常被杀，田地遭到破坏。可是，只要你缴纳了保护费，在西西里就会很安全。你甚至可以请黑手党的人帮你望风，好让你与心爱的姑娘约会。尽职的玛菲亚人会在合适的地点派一个人，手里拿着点燃的蜡烛，以此告诉行人，这里有一对情侣不想被你们打扰。

西西里的小偷也都受到黑手党的有效管理。曾经有外国游客到西西里某处，和当地的教父打了招呼，交了钱，教父便通知当地所有小偷，不能打该游客的主意。可是，游客的钱包还是不见了。教父很快查到那个冒失的小偷，一刀把他的一只眼睛剜了出来。

最需要提到的，是黑手党的“缄默原则”——绝对不向外人泄露任何黑手党的信息。这是黑手党世界的根本法则。一旦有人违反，必死无疑，帮里的人会追杀他到天涯海角。在意大利的一些监狱中，甚至有党徒公然在墙壁上写标语：缄默安宁百年，开口便下地狱！另外，许多黑手党组织有自己的手势暗语，外人根本看不懂。因此，很少有外人能了解其内部情况，政府也拿黑手党无可奈何。

黑手党崇尚勇敢、果断和深谋远虑。早年，黑手党两大帮的对抗，有个教父是被夹在中间的一个小帮的首领。双方都想拉拢他，他摇摆不定。一个大帮的首领丧失耐心，把他抓去打成熊猫眼。他立刻倒向另外一帮。接受的那帮麻痹大意，毫不怀疑，很快就在一次偷袭中被他全歼。此后，他又抓住机会，把曾经打过他的大帮击败。他因此成了称霸西西里的黑手党教父，赢得了玛菲亚人的尊敬。

为保护自己，黑手党会毫不犹豫地杀掉妨碍他们的人。这些谋杀的大胆程度骇人听闻，事后，杀人者却往往逍遥法外，因为没人敢出庭证明对黑手党不利的事实。

黑手党遭到的最大打击来自墨索里尼。墨索里尼上台后，按意大利政坛不成文的惯例，必须到西西里岛向某个有影响力的教父致意。墨索里尼在西西里表现得非常傲慢，该教父决定给墨索里尼一点颜色看看。于是，在演讲开始的时候，元首无比尴尬地发现听众居然屈指可数。讲话的过程中，元首还气恼地发现，自己的帽子不翼而飞。

墨索里尼恨透了黑手党，不久，他向黑手党宣战。墨索里尼命令一个以冷酷无情著称的警察局局长去西西里收拾这些人，并授予他全权：“为了消灭黑手党，你可以做任何事，因为那对国家有利。”黑手党人被大批逮捕，坚持“缄默原则”的死硬分子不经过法庭审讯就被直接处死。一队队的教父们被押送到墙边用冲锋枪打成筛子。

二战后，黑手党很快死灰复燃。在意大利，黑手党重新操纵政坛，继续过去的“生意”。有不少法官、检察官不甘心向犯罪分子低头认输，结果被暗杀。偏偏意大利又废除了死刑，还制定了一部《刑事诉讼法》，在这部刑诉法中，对被告人的保护简直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这些都使得黑手党在意大利异常猖獗。

此外，黑手党还通过收买政府官员的方式，控制了意大利的几乎每一所监狱。黑手党定期掌握监狱中囚犯的资料，从中筛选、吸收有发展潜力的亡命之徒。由于某些差错，要入狱“小住”的黑手党人，则有黑手党跟监狱打招呼，受到很好的“款待”，在监狱中生活得有滋有味，监狱管理人员不但不能虐待他们，还必须看他们的眼色。

意大利人民对无法无天的黑手党忍无可忍，游行示威，抗议政府对待黑手党问题的软弱态度，要求政府对黑手党采取铁腕措施，还要求政府恢复死刑。

黑手党是政府效率低下的产物。政府收税，黑手党收保护费；政府有刑法，黑手党打击对他们不利的人。但黑手党的效率却超过政府。在意大利，逃税也许可以逃脱处罚，而欠保护费则必然会有可怕后果。

摘自《大科技》

282年前的英国股灾

在人类历史上，由于愚昧、贪婪、盲目、自负等人性固有的弱点，导致过许多愚不可及的蠢行，演绎出一幕幕可笑可叹的闹剧。

公众对无穷无尽的财富的渴求被唤起了

16世纪，西班牙人从墨西哥和秘鲁的金矿、银矿那里聚敛了巨大的财富。当时，没有哪一个国家像英国那样对财富充满了渴望与贪求。在此后的一个世纪里，英国人进行了多次努力去打入南美市场，但均无功而返。最后，英国利用自己在1713年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中的胜利，强迫西班牙签订了《阿森托协议》。该协议允许每年可有一艘英国船只与墨西哥、秘鲁或智利从事贸易。即便如此，新成立的“英国南海公司”还是在这些最吝啬的准许条件下，激起了公众的极大信心。由于某些原因，英国民众忽视了一个事实，即从西班牙国王手里搞到黄金，要比从铅矿石中提炼黄金更难。在他们的想像中，“南海公司”已站在了巨大的创业成功的边缘。

南海公司提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他们将从民间融资200万英镑，并用这笔资金作为认购全部政府债券的底金。虽然该公司与南海贸易往来极少，贸易收益也很低，但它的名头却唤起了公众对无穷无尽的财富的渴求，使得他们甘愿在这个投机项目上冒险一试。

每一个伦敦人都似乎摇身一变成了投资人

1720年2月2日，英国下院通过了该计划。从此刻起，该公司的股票价格就以惊人的速度上涨，一天之内就翻了3倍。在疯狂的投机期间，只有辉格党政客罗伯特·沃尔波尔还保持着心理平衡，他警告人们当心股票投机的风险，但是没人听得进去。他们准备把自己的房屋、生计全部押到这场对虚幻财富的徒劳追求上。

为了提高南海公司股票的价格，公司董事们到处散播利好的谣言(显然是虚构的)，说英国与西班牙之间已达成了令人鼓舞的条约。结果，南海公司的股票价格扶摇直上，达到了令人难以想像的高度，每一个伦敦人都似乎摇身一变，成了投资人。

正当那些假冒南海公司董事的无赖们大肆欺诈绝大多数伦敦市民时，其他一些企业家—— 一些是合法商人，另一些则是纯粹的骗子——开始从阴暗的角落现身出来，被称为“泡沫”的数十家新生的联合股份公司开始在交易市场上市。

英国的上流阶层，不管是男是女，都沉迷于金融投机之中。男士在酒店和咖啡屋里与自己的经纪人会面，女士们则在女帽专卖店和小商品缝纫店里忙于同样的事情，一时间成为一种时尚，但实际上是纯粹的黄粱迷梦。

随着股价下跌许多人面临着毁灭

6月11日，国王宣布，“泡沫公司”有害于公益，其所从事的股票买卖行为不合法。直到此时，“泡沫公司”的董事们才受到起诉和罚款。然而，“大鱼”早已携其所得逃之夭夭，只留下“小鱼小虾”来收拾残局。

尽管国王开始干预，还是有一些“泡沫公司”的股价扶摇直上，许多愚蠢的投资人还想注入资金。与此同时，南海公司的股票价格仍在上升。那些没有完全被贪欲蒙蔽的投资人大都看得出来，其股价已超过了任何实际的水平，随时都注定要大幅下跌。结果，许多大的投资人在获利之后，把自己的股票抛售一空。6月3日这天，大批的卖方出现在交易市场，准备出手，买进者却如此之少，结果股市一路下跌。

随着股价的一路下跌，许多普通人面临着毁灭。各地的抗议者纷纷涌向伦敦，要求对南海公司的邪恶行径进行法律制裁。

财政大臣艾斯拉比爵士在1720年2月的国会辩论中，曾站在南海公司一边说话，现在被怀疑有财务问题而被迫辞职。然而，他还是难脱其咎，不久就被剥夺了下院议员身份，并被关进了伦敦塔，以防他与奈特一起外逃。艾斯拉比在被押往伦敦塔的途中，遭到了塔山上大批无法控制的暴民的讥笑和嘲弄。由于不能在这位已垮台的政客身上发泄愤怒之火，他们就点起火堆，焚烧他的画像。

罗伯特·沃尔波尔在这次危机中显然要比其他政客聪明得多。他坚持认为，恢复公众的信心是目前政府的第一要务。在他的努力下，投资人挽回了不少于1/3的损失，但这并不足以把他们由自己的贪婪造成的后果中挽救出来。

摘自《北方周末报》

腰斩酷刑

鲁迅说中国人是“最能研究人体、顺其自然而用之的人民。脖子最细，发明了砍头；膝关节能弯，发明了下跪；臀部多肉，又不致命，就发明了打屁股……”至于坚韧挺拔的腰骨，构成了做“人”顶天立地的形象，向来关系着中国人的“气节”与“风骨”，统治者也许是怕臣民们嶙峋的风骨，就发明“腰斩”的酷刑，妄图教化出奴性的顺民。

韩信豪迈迎腰斩

殷商时代的死刑，保留了不少原始部落享受人肉大餐的习俗，烧、烤、蒸、煮，无不围着口腹之欲打转。到了周代，“砍斫”逐渐取代“烹饪”，成为死刑的主流，有车裂、斩和杀三种。“斩”就是腰斩，“杀”是斩首。

腰斩在行刑时，犯人必须脱光身上的衣服，使腰部裸露出来，伏在铡床或木、铁的砧板上。普通人至此早已魂飞魄散了，但总有那么个别不畏死的“牛人”。秦末楚汉相争，韩信离楚投汉时还是个无名小卒，因犯军法当受腰斩。一同被处死的十三个人被斩之后，轮到了韩信，他居然仰躺在砧板上直视刀刃，大呼：“刘邦那小子不是想夺天下吗？为何要斩杀壮士！”监斩官夏侯婴闻此言，被他的勇气和豪壮折服，不仅没有杀他，还将他推荐给刘邦，让他做了个管粮饷的都尉。

李斯腰斩前痛悔

李斯相秦，功劳很大。灭诸侯，成霸业，一统天下，始皇帝的千古功绩，有一半得算到李斯的头上。但位极人臣又怎样？仍逃不开被指鹿为马的小人诬陷，身被五刑(黥、劓、斩左右趾、枭首、剁成肉酱)，腰斩于市，夷灭三族！这位在骊山脚下坑掉数百名儒生，连眼睛也不眨一下的大秦丞相，如今轮到他领教自己厘定的酷刑，在自己培养出来的刽子手的刀下，俯首就刑。腰斩前，李斯对着一起奔赴黄泉的儿子，追忆起当年领着孩子们，牵着猎狗，追逐成群狡兔的无忧岁月。“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这一句痛悔交加的呼喊，是他对其追逐权力的一生的彻底否定和决绝。

最后一次腰斩给了考官

历史上最后一次腰斩判给了清代河南学政俞鸿图。雍正年间，俞鸿图督学闽中(今福州市)，科考防范颇严，操守亦称严谨。未料他的小妾与仆人串通，收取贿赂，其妾把考试材料贴在俞鸿图官服背后补褂之上，俞鸿图穿出去，仆人轻轻地揭去授给应试者，而他一点也没觉察到。事发后，雍正皇帝将俞鸿图处以腰斩极刑。

腰斩之酷烈，连性格刚戾的雍正皇帝也动了恻隐之心，遂命封刀。如果记载不误的话，从周代到清雍正年间止，施行了两千多年的腰斩刑罚，算是寿终正寝了。

摘自《追寻历史的真相》

宋朝南人不食面

宋朝时的南方人不大吃面，有一个重要原因：觉得面食有毒。

早在五代时期，淮河以南就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说是达摩老祖来华传道，见到有人吃面，就上前把人家的饭碗打翻在地，喝道：“安得此杀人之物?”意思是面有剧毒，吃了会死人的。

关于达摩的故事有些扑朔迷离，可信的成分不多，然而在宋朝的医书里面，也提到了面食有毒。如北宋医学名家唐慎微编著的《经史证类备急本草》：“小麦乃世之常食之物，然经火煮而食之，其性壅热，善动风气，此甚验也。”说明在宋朝医学界，至少一部分朋友是相信面有毒的。

问题是，如果面食有毒，那么以面为主的北方人怎么没有中毒呢？宋朝人另有补充：“西北麦经霜雪，南方少雪，故面有毒也。”(《瑣碎录》)意思是说，小麦含热毒，而霜雪能解这种热毒，北方小麦经过了秋霜冬雪，所以没毒；南方小麦很少有机会遇到霜雪，所以有毒。事实上，这些说法毫无科学道理。不过那时候的人缺乏实证精神，你怎么说，我就怎么信，好多荒诞不经的说法都能成为真理。

也有的南方人不大理性，总想来碗面条换换口味，可是又怕中毒，怎么办呢？两条对策：一、面条锅里多放萝卜汁，萝卜汁能解毒；二、多准备一只锅，把面条煮到半熟，换只锅接着煮，这样面毒就能散进面汤里，倒掉面汤，只吃面条。

这两条对策也很荒诞，不知道当时会有多少人相信。

摘自《祖宗的生活》

谦 让

梁实秋

谦让仿佛是一种美德，若想在眼前的实际生活里寻一个具体的例证，却也不容易。类似谦让的事情近来似乎很难得发生一次。就我个人的经验说，在一般宴会里，客人入席之际，我们最容易看见类似谦让的事情。

一群客人挤在客厅里，谁也不肯先坐，谁也不肯坐首座，好像“常常登上座，渐渐入祠堂”的道理是人人所不能忘的。于是你推我让，人声鼎沸。辈分小的、官职低的，垂着手远远地立在屋角，听候调遣。自以为有占首座或次座资格的人，无不攘臂而前，拉拉扯扯，不肯放过他们表现谦让的美德的机会。有的说：“我们叙齿，你年长!”有的说：“我常来，你是稀客!”有的说：“今天非你上座不可!”事实固然是为让座，但是当时的声浪和唾沫星子却都表示像在争座。主人摆一张笑脸，偶然插一两句嘴，作鹭鸶笑。这场纷扰，要直到大家的兴致均已低落，该说的话差不多都已说完，然后急转直下，突然平息，本就该坐上座的人便去就了上座，并无苦恼之相，而往往是显得踌躇满志、顾盼自雄。

每次遇到这样谦让的场合，我便首先想起《聊斋》上的一个故事：一伙人在热烈地让座，有一位扯着另一位的袖子，硬往上拉，被拉的人硬往后躲，双方势均力敌，突然间拉着袖子的手一松，被拉的那只胳臂猛然向后一缩，胳臂肘尖正撞在后面站着的一位驼背朋友的两只特别凸出的大门牙上，咔嚓一声，双牙落地！我每忆起这个乐极生悲的故事，为明哲保身起见，在让座时我总躲得远远的。等风波过后，剩下的位置是我的，首座也可以，坐上去并不头晕；末座亦无妨，我也并不因此少吃一口。我不谦让。

考让座之风之所以如此盛行，其故有二。第一，让来让去，每人总有一个位置，所以一面谦让，一面稳有把握。假如主人宣布，位置只有十二个，客人却有十四位，那便没有让座之事了。第二，所让者是个虚荣，本来无关宏旨，凡是半径都是一般长，所以坐在任何位置(假如是圆桌)都可以享受同样的利益。假如明文规定，凡坐过首席若干次者，在座叙上特别有利，我想让座的事情也就少了。我从不曾看见，在长途汽车车站售票的地方，如果没有木制的长栅栏，而还能够保留一点谦让之风！因此我发现了一般人处世的一条道理，那便是：无需让的时候，则无妨谦让一番，于人无利，于己无损；在该让的时候，则不谦让，以免损己；在应该不让的时候，则必定谦让，于己有利，于人无损。

小时候读到孔融让梨的故事，觉得实在难能可贵，自愧弗如。一只梨的大小，虽然是微不足道，但对于一个四五岁的孩子，其重要或许并不下于一个公务员之盘算简、荐、委。有人猜想，孔融那几天也许肚皮不好，怕吃生冷，乐得谦让一番。我不敢这样妄加揣测，不过我们要承认，利之所在，可以使人忘形，谦让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谦让作为一种仪式，并不是坏事，像天主教会选任主教时所举行的仪式就蛮有趣。就职的主教照例地当众谦逊三回，口说“nolocpiscopari”，意即“我不要当主教”，然后照例地敦促三回，终于勉为其难了。我觉得这样的仪式比宣誓就职之后再打通电声明固辞不获要好得多。谦让的仪式行久了之后，也许对于人心有潜移默化之功，使人在争权夺利、奋不顾身之际，不知不觉地也举行起谦让的仪式。可惜我们人类的文明史尚短，潜移默化尚未能奏大效，露出原始人的狰狞面目的时候要比雍雍穆穆地举行谦让仪式的时候多些。我每次从长途汽车的售票处杀进杀出时，心里就想先王以礼治天下，实在有理。

摘自《雅舍小品》

向每一个方向微笑

张翔

刚在伯明翰大学落脚的第三个月，我去拜访了一个姐姐的朋友艾伦，她曾在北大留学，和姐姐是要好的朋友。我拨通了她的电话后，她很是惊喜，并且用半纯正中国话邀请我第二天就去她家做客。我忽然从心中升起一股温暖，这还是我在这个国家第一次听到如此熟悉的中国话，虽然多少有点牵强生硬。我有些后悔没有早点拨通她的电话。

第二天上午，我特地去买了一束鲜花，带着一些国内的小饰品去拜访她。坐上公交车，穿越一条条长长的街道，我怀揣着一种回家的心情去看她和她的家人。

她家住在一个美丽的花园小区里。进了大门，我看到里面全是统一的单栋旧楼，房子太多，而路标和楼牌都不怎么明显，我无法确认哪户是她家了。于是到她家附近时，我拨通她的电话，她说马上出来接我。

刚刚挂完电话，我便听到一个稚嫩的声音在大声呼唤着“叔叔”，是一句生硬的中国话。我扭头望去，就在不到十米远的一个花园的门口，一个金发的小女孩在对着她门前的各个方向左右开弓地喊着“叔叔”。我想这可能就是艾伦的女儿妮娜了，我在国内曾看过她小时候的照片。我想大概她很少见中国人吧，分辨不出哪个是中国叔叔，但是只要说中国话，我总还是听得懂的。于是我奔上前去，回应道：“妮娜，我在这儿呢!”

她忽然扭头，给我露出一个甜美纯真的笑容，再一次喊了一句“叔叔”，然后伸开了手臂，却站在原地，没有移动，等着我去拥抱她。我定神一看女孩的眼睛，那是一种含笑弥散的眼神，我猝然惊醒了，原来妮娜的眼睛是看不到东西的，怪不得分辨不了我的位置了。

我上前抱起她，亲了一下她的脸颊。她小脸一歪，笑容盛开。

我问她：“你妈妈在哪?”

她回答道：“对不起，妈妈在接一个很紧急的电话，她让我出来接你!她说我只要勇敢地向每一个方向都呼唤一下‘叔叔’，就准行的，就总有一个方向会传来你的回应的!”说着她的小脸又浮起一种成功的喜悦，为能接到我而兴奋不已，说道：“叔叔，你在笑?是吗?”

我说：“是的，像你一样!”

“妈妈说如果我没有等到你的回应，就是我说不好中文，那我只好对每一个方向微笑了，总有一个方向的人会认识并回应我的微笑的，那就是你！是这样吗?”

听到这句话时，我的心中忽然一颤，仿如天光开雾般的彻朗!我在想，我来到这个陌生的国度以来，即使那么健康地面对这个世界，又何曾尝试过向陌生的人微笑呢?更不要说是向每一个方向呼唤一个陌生人了。

“叔叔，你能认识我的微笑吗?”我从沉思中醒来，回答道：“哈哈，是的!每一个人见到你美丽的笑容都会回应你一个微笑的。”

这时艾伦出来了，表示着歉意，把我迎了进去……

在后来的日子里，我常常去看望妮娜。我还没到她家门口，就总能听到她在用汉语向每一个方向呼唤着我，我总是那么急切地回应着她，她会冲着我的方向微笑，而我也会用微笑回应着她，即使她什么都看不到，因为我确信她在等待着有一个人会回应她的微笑。

我也渐渐变得开朗起来，慢慢地融入和喜欢上了这座城市和这里的人，因为我也像妮娜一样，学会了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向每一个方向呼唤和微笑。

摘自《小品文选刊》

这个狗日的谢冬生果真有一把，他吞下了我买给他的一斤米饭。我觉得自己有点儿亏，躺在床上不大说话。没多久，谢冬生就来事了，他躺在床上说肚子胀得难受。

1982年的校园生活

杨崇德

那天突然落起了雨，但一点儿也不影响我们的心情。星期六对我们这些长期寄宿的农村学生来说，永远都是受欢迎的。

上午第四节课一结束，我们就会争先恐后冲出教室，扑通扑通下楼，然后顺着那条土多石少的校园小道拥向寝室，呼啦啦地取碗，转身朝食堂方向跑。那个年代，我们好像都没吃饱，学校住宿的人多，谁跑在前面，谁就可以早点儿填肚子。我已经说了，那天落着小雨，下课后，我们像一群鸭子拼命往外拥。也该是他谢冬生出丑的时候，路那么滑，他又是那么瘦，还是手舞足蹈往前奔，以至于来了个四脚朝天，爬起来时，满身是泥。对于这种事，大家习以为常，都在笑声中继续奔跑，有点儿像军号已吹响的战场。

倏地，食堂的外面排起了长长的队。队伍的尾巴已经伸在了露天场。

谢冬生的那一跤让我有点儿胆战心惊，这一次，我落伍了。没有伞的自然就不大愿意冒雨站在队伍的尾巴上。我只好抱着空碗躲在墙角边。我和站在队伍前面的几个同学打了招呼，要求他们默认我就是他们身后的排队人，可是，他们都表示很为难，主要是他们后面的排队人个个不答应。因此，我只好抱着空碗守在墙角边看天行事。只要雨落得小一点儿，我就会站在队伍的尾巴上去。我用一种无奈的目光打量着那面被无数人用身体磨光的墙面，这时，我发现墙面有一道缝，里面躺着一张蓝色饭票。要知道，学校的蓝色饭票一律都是一斤饭票!我的心咯噔了一下，兴奋就像虫子一样爬上来。通常情况下，我每餐的饭量都是控制在四两米以下，家庭状况不允许我敞开肚皮。再说，那时候的半斤米在大师傅固定的钵子里摆弄几下，到我们碗里也就那么多，有时比四两米还少。我不知道，我们的队伍中有多少人与那个盛米饭的肥胖女人有过节，全是因为盛饭时手抖动得太厉害。

我有点儿担心我身边的那几个也会把无奈的目光投向这道墙缝，那样的话，事情就不好办了。我很自然地用身体贴住那面墙。队伍像一条虫在扭动。身边走了几个排队的，但马上又来了几个怕雨淋的。我发现与我一块儿冲向食堂的都已经端着碗离开了，可我还是不觉得遗憾。我脑子里是这样安排的：今天是星期六，晚上不自习，明天还可以睡懒觉，那么，今天晚上就该好好庆祝庆祝，吃它一斤米饭!剩下的，明天再享受一顿。对于捡来的一斤米饭，我相信，每个人都会这样善待自己。

我是在很多人洗碗的时候才从食堂端饭上来的。当然，那张躺在墙缝里的蓝色饭票，我没机会下手。不过，下手只是迟早的事。

下午的课，我基本上没听进去。我一直挂念着那张蓝色饭票。机会终于来了，第二节课，老师只讲了20来分钟，就给我们布置了作业。真希望老师有点儿事，那样的话，我就可以行动了。就是那么灵验!老师真的不见了。我再一次望了望教室，个个都在埋头做作业。

我的步子很轻，很快就下了楼。食堂的门紧闭着。饭票还在那堵墙里。我必须尽快把它掏出来，不然，就麻烦了。也不知是哪个背时的无聊者把这张饭票塞得那么深，可能他也是在这里掏了很久才最终放弃的。

我的天呀，真的是一斤米的饭票!

这个周末，我过得很丰盛：两个饭，两个菜。同寝室的谢冬生似乎有点儿不服气，他对我说，这么大的个子，只能吃一斤呀?我瞥了这个长得精瘦如柴的家伙一眼，说，你吃得下吗?谢冬生就说他某某时候吃过一斤半。那时，我已经吃下了一碗半，被谢冬生这么一说，我很没胃口。我说，你只要能吃一斤四两就算你狠!顿时，寝室里很多人就搭起话来，包括我们班长。他们都建议我和谢冬生赌一把。规则是：再给谢冬生买一斤米的饭和一个主菜(谢冬生已经吃了四两饭)，如果他能吃下，就算我请客；如果谢冬生吃不完，就赔我一斤半饭票。

寝室里的人已经分成了两派，一派是帮谢冬生说话，一派是帮我说话。两派的意见说白了，就是要我和谢冬生赌一赌。反正一斤饭票是捡来的，充其量就是赔个主菜钱!我在心里盘算着。我决定豁出去。

这一晚，很多人没去教室自习，都围在寝室里看谢冬生吃我的赌饭。

这个狗日的谢冬生果真有一把，他吞下了我买给他的一斤米饭。我觉得自己有点儿亏，躺在床上不大说话。没多久，谢冬生就来事了，他躺在床上说肚子胀得难受。有人建议送他去医院，但马上就被否决了，大家都怕老师知道这事。最后，也不知是谁出的主意，建议用水冲洗谢冬生的肚子，说是水能帮助消化。谢冬生已经连走路都困难了，他被我们抬到寝室外面的水龙头边。我们用水冲洗他的肚子，还有人帮他按摩肚皮。就这样折腾了一个多小时，谢冬生才感觉好些。

那一晚，我基本上没睡着。

摘自《天津文学》

犀 牛

佚名

一个年轻聪慧的学生去向一位中国的智者请教：

“尊敬的老师，请告诉我如何才能获得您那样的智慧呢?”

“爬到那座山的山顶，”智者说，“然后祈祷，但是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别去想犀牛!”

“犀牛是什么东西?”年轻人满是疑惑。

“哦，那是一种大块头动物，鼻子上还长了个巨角。”智者回答道，“但是你不用担心，因为我们在中国而犀牛只生活在遥远的非洲。”

最后年轻的求知者爬上了高山准备祈祷，但这时他满脑子都想的是犀牛。

生活中我们常为一些毫无根据的恐惧所困扰着而忽略了真正重要的东西。

摘自《西安晚报》